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2.012

孤寂意识：鲁迅思想的原点

于浩男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孤寂感是鲁迅感触最深的生命体验和进行文化选择的重要心理动因，鲁迅的先觉者思想意识正是以孤寂意识为基底形成的。孤寂意识不仅指向自我审视，还具有个人—他者的内涵，其催生了鲁迅对社会、家庭及个体精神的思考。孤寂意识赋予了鲁迅思想积极的内涵和对自身孤寂命运、复杂思想清醒的自觉。一方面，鲁迅在孤寂感中遭遇精神苦难；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警惕这种孤寂感并对民族之命运表现出强烈的关怀。这也是其孤寂意识的复杂性所在。

关键词：鲁迅；孤寂意识；思想原点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23)02-0097-09

引用格式：于浩男. 孤寂意识：鲁迅思想的原点[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2): 97-105.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The Origin of Lu Xun's Thought

YU Haon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loneliness is Lu Xun's deepest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and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otivation for his cultural choices. Lu Xun's pioneer thought is also based on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which not only points to self-examination, but also has a self-other connot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Lu Xun's thinking about society, family and individual spirit.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endows Lu Xun's thought a positive connotation and a sober self-awareness of his own lonely fate and complex thoughts. On the one hand, Lu Xun suffered spiritual suffering in his lonelines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highly alert to this loneliness and showed strong concern for the fate of the nation. This is where the complexity of his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lies.

Keywords: Lu Xun; loneliness consciousness; origin of thought

“孤寂”是理解鲁迅思想内核的重要切入点，学界对此有较为广泛的关注。学界首先是对鲁迅孤寂意识的成因进行了研究，有研究者指出，先觉者的意识是鲁迅孤独感的主要成因，“超前性”

使得作为先驱者的鲁迅面临历史的脱节并产生孤独、寂寞与精神苦痛；有研究者从鲁迅各阶段的人生历程中选取典型事件阐述其孤独感的成因；还有众多研究者提到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对鲁迅

收稿日期：2022-10-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

作者简介：于浩男（1993—），男，内蒙古通辽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鲁迅、延安文学。

精神生活的影响。纵观这些成果,研究者大多认为鲁迅的孤独最先是源于他的先知先觉。对鲁迅孤寂意识的“发生”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先觉者的思想意识正是以孤寂意识为基底产生的。以往的研究通常从历时的角度去清理鲁迅孤寂意识的流变,这样容易忽略孤寂意识正是鲁迅在对过往经历的不断回溯中强化起来的事实。笔者以为,鲁迅对自身孤寂感的认知并非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十分清醒,其孤寂感是他人生不同阶段所感受到的孤寂感的集合。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主动选择了与他的人生体悟(包括孤寂感)相符合的文化,孤寂感正是他进行文化选择的重要心理动因。笔者认为,孤寂意识形成于鲁迅的生命回溯与文化选择中。

一些研究者对鲁迅孤寂意识与其对外部世界的关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如提到鲁迅的立人思想,部分研究者通常这样梳理鲁迅孤寂意识与立人思想的关系:鲁迅的孤寂——表达对人的解放的关注,达到了对个人、自我的肯定——形成立人的思想——设计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类解放蓝图。这样的阐释,更倾向于在总体上串联鲁迅思想的几个核心,但它们之间如何演变、鲁迅如何从孤寂意识中形成对个人的关注与肯定进而发展为立人的思想、鲁迅的孤寂意识究竟如何影响了其文学与思想活动等等方面的研究尚不完善。基于对鲁迅当时的心灵脉动的细致分析,笔者认为,正是孤寂意识催生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及其对社会、家庭及个体精神的思考。

还有一些研究者对鲁迅孤寂意识的积极内涵进行了研究。在探求鲁迅孤寂意识的积极因素时,有学者认为,精神深处的黑暗、虚无、孤寂、绝望与革命运动或反抗绝望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消解并提升了他的孤寂。这样,鲁迅的孤寂形象最终和战斗者的形象融合,对孤寂的考察的结果也更多指向了鲁迅思想的崇高性而非复杂性。笔者认为,如果去梳理鲁迅如何看待、处理自身的孤寂,如何将孤寂的苦痛与对孤寂的抗争进行调和而不是简单地通过斗争精神去消解,便会发现,鲁迅孤寂意识的积极内涵在于其赋予了鲁迅对自身孤寂命运及复杂思想的清醒的自觉。

基于此,本研究首先梳理鲁迅孤寂意识的成因,即回到历史语境与文学文本中去考察其如何

“发生”;其次考察孤寂意识对鲁迅文学创作及其思想各个方面的影响;最后考察鲁迅孤寂意识的积极内涵与复杂性。想要潜入人的思想深处,就要追溯其思想背后潜意识的精神基底和最初且较为强烈的情感体验。通过对鲁迅的思想与精神历程系统的清理,笔者发现,这种可供追溯的精神基底和情感体验正是鲁迅的孤寂感,鲁迅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可以从其孤寂意识中找到源头,也可以说孤寂意识是鲁迅思想的原点。

一、孤寂意识形成于鲁迅的生命回溯与文化选择中

鲁迅的孤寂意识如何“发生”,在其文字中有较为清晰的线索。鲁迅早在1903年就使用过“寂寞”一词^{[1]164},在其早期文言论文中“寂寞”一词也反复出现,但鲁迅真正系统地描述、总结自己的“寂寞”心境,是在后来的《呐喊·自序》^{[2]437}中。这也表明,鲁迅的孤寂意识是其在对过往生命经历的不断回溯中强化起来的。换言之,鲁迅的孤寂意识既有历时性,但在历时中也包含着人生各个阶段孤寂意识在其思想中的共时,这是其孤寂意识的复杂性的一种体现。《呐喊·自序》中出现的10次有关“寂寞”的叙述,可以看作是鲁迅孤寂意识的纲要,也涵盖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的创作心境。这与《呐喊·自序》形成的语境有关。此前,鲁迅已走出第一次长达10年的沉默与绝望,呐喊于新文学阵营。然而,1921年1月8日,鲁迅在一封回复有关胡适企图改变《新青年》杂志性质的信件中写下这样的批注:“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趋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所以索性任它分裂”^[3]。鲁迅在1932年《〈自选集〉自序》中回顾到:“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4]469}从时间上来看,这正是他1922年12月3写作《呐喊·自序》时的心境。虽然此时的鲁迅尚未进入主要因1923年兄弟失和而导致的所谓人生中的第二次沉默与绝望的阶段,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此时已经连带着10年沉默的苦闷,再次流露出了精神的彷徨迹象。所以,梳理鲁迅孤寂意识的形成,《呐喊·自序》成为无法绕开的重要依据。

写作《呐喊·自序》时,鲁迅的生命体验中已

经包含了过去与现在的寂寞，即鲁迅所谓回忆的寂寞、已逝的寂寞、当日自己的寂寞以及自以为苦的寂寞。回溯鲁迅的情感经历，寂寞感是他最早也是感触最深的心理体验之一。童年因祖父和父亲暴躁的脾气而带来的压抑、自卑等心灵创伤，家道中落所经历的冷漠与冷眼，使得孤寂早已潜伏在他身上。走异路去往南京，在日本遭遇蔑视，在“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的慨叹中感受到启蒙呼唤无人响应的孤独，《新生》的破产，《域外小说集》销量的惨淡，《破恶声论》写作的夭折，回国后被迫担负生计的重担，在所失望和厌恶的政府官僚机构中任职，这些都使他的孤寂一天一天地增加。辛亥革命失败，军阀混战，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使得他的孤寂伴随着前所未有的悲哀。绍兴会馆多年的只身沉寂，性的压抑，所感到的生命的暗暗消去，因需听将令和鼓舞青年而导致的不可说不能说，对充当新文化潮头的犹疑，因新文学阵营分化而布不成阵的无奈，等等，最终汇成了鲁迅彼时也即写作《呐喊·自序》时的寂寞。其次，《呐喊·自序》预示了鲁迅未来的某种寂寞，显示着鲁迅在表同情于他者的寂寞中承担自身的寂寞。鲁迅的孤寂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他从自身的孤寂体验出发，因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而一直同情于他者的寂寞，意图使之摆脱寂寞。所以，他“听将令”呐喊助威于寂寞的《新青年》同人，慰藉于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他一再提到：这些战士，虽在寂寞中，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4]468}；我之所以投稿，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5]4}；“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2]298}；请不要“坠入孤独和悲哀去”，因为“本意不在这里”^{[6]539}。可见，鲁迅清醒地意识到了自身孤寂思想的复杂性，他的开口与所言，已经是权宜的结果，这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有着更为深广的体现。鲁迅一直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传染给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他要不断地运用曲笔，要“骗人”，而外在黑暗现实的压迫也使他空虚至不能开口，对自身阴暗与绝望思想的怀疑使他无从开口，他将长期彷徨在沉默与开口、充实与空虚、对自我言说与对他人言说之间的矛盾与裂痕中，这决定了他要独自承担与搏斗那不被理解甚至自我怀疑的痛苦与寂寞。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写作《呐喊·自序》时鲁迅的思想，其在生命体验中形成的自身心灵的脉动与苦痛，其在处理自我与外部关系时所形成的矛盾与犹疑，都在他后来的人生中反复出现。鲁迅的孤寂意识，在这里已经真正形成，并越来越影响着他观照世界的方式，他的孤寂命运也在这里被暗示、注定。

也应该看到，鲁迅思想是其对自身经历的体悟和对外在文化的接受的集合。鲁迅主动选择了与他的人生体悟（包括孤寂感）、情绪气质相符合的文化，孤寂感正是他进行文化选择的重要心理动因。如果说生命体验是鲁迅孤寂心理气质形成的现实基础，那么对来自古今中外文化的接受，则加深了鲁迅孤寂的心理及其文化内涵，并推动了鲁迅孤寂意识的形成。在10年沉寂中，鲁迅分析着陷于转折时代的嵇康等人思想和行为之间的不协调的精神痛苦，体味着魏晋文人的精神重担——他们既不能超越社会政治的泥沼，也无法在回归自然和艺术中得到解脱^{[7]39-40}，这种知识者怎样决定自身存在价值的精神困境无疑弥合了鲁迅内心的孤寂感。鲁迅倾心于正史及儒家“正统”之外的典籍以及庄子、屈原、魏晋风度，这传达出鲁迅心理气质的叛逆性、异质性，以及对反传统、个性解放、个人本位、不取媚于群的心理认同。可以说，这种认同多少共情了鲁迅孤寂的生命体验。从《离骚》起，围绕着孤寂、感伤、苦吟等情愫而抒情，是中国文学及文人的重要传统之一。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表达新文学阵营解体后布不成阵、找不到新的战友的彷徨心境时，就引用了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鲁迅在与世疏远的孤寂的行吟者屈原那里找到了某种共鸣。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民间文化同台竞逐，鲁迅的寂寞感与孤独个体的意识，正是他受到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影响的重要心理前提。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引用的尼采假查拉图斯特拉之言“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可以说正是鲁迅自我的画像；又提到施蒂纳“乃先以极端之个人主义现于世”，认为“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还提到克尔凯郭尔“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2]45}；等等。可见，鲁迅的个体意识与孤寂思想，在20世纪初西方非理性主义文化思

潮中找到了呼应。此外,根据研究者考证,以《域外小说集》为例,鲁迅译介外国作品有意识地偏重俄国、东欧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选取的作品大多弥漫着压抑、虚无的情绪^{[7]21-22},鲁迅与这些作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民族的边缘化与寂寞感、人的精神的苦闷以及孤独感产生了共鸣。同时,不论是面对五四高潮时的躁动、五四退潮后的彷徨,还是面对大革命来临时不安的时代气氛,鲁迅都有一种孤寂感。他始终与社会文化潮流保持清醒的距离,这也因此加剧了作为先觉者的鲁迅的寂寞及他与时代的隔阂。另一方面,20世纪前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始终处在苦苦探寻民族出路、时有歧路彷徨的寂寞感中,鲁迅的寂寞也融进了时代的寂寞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孤寂感,只是人的一种心理体验,而孤寂意识,则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人对自身孤寂感或孤寂命运的清醒的认知与把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鲁迅的孤寂意识是建立在对过去、现在的孤寂的心理体验的回顾的基础上的,并从包含孤寂感在内的心理体验出发,自发接受了来自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中的孤寂感。在这一过程中,他对自身的寂寞以及自我与外部世界的隔膜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与体悟,他已能够将自身的寂寞与他者的寂寞、他人的思想体系进行区分与处理,并在与他者的寂寞与生存境遇的反证中达到新的自觉。这也意味着他的孤寂意识是在与外部世界的隔膜中不断增强的,进而形成了一种自我意识,其贯穿于他的思想情绪、心理气质、创作倾向、生命体验及存在状态之中。

二、孤寂意识催生了鲁迅对社会、家庭及个体精神的深沉思考

在文艺心理学的阐释中,“艺术创作往往是在某种情感的驱使下进行的,情感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具有一种内驱力的作用”^[8]。孤寂意识作为一种思想情感的表现形态,不仅影响着鲁迅的文化选择,也直接影响并催生了鲁迅的文学创作,它是鲁迅思想的重要原点。鲁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引述了厨川白村的话:“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1]257}这句话概括了厨川白村受弗洛伊德等人的影响而形成的艺术观。在《小杂感》中,

鲁迅更将内心的苦闷指向了寂寞:“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可见鲁迅自身也认为寂寞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心理原点。此文中鲁迅又说,“创作总根于爱”,“创作是有社会性的”^{[9]556}。这显示了鲁迅孤寂意识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向内发现和体味自我,感受、捕捉自身缠绕着孤寂感的心理情感,进而形成对个体精神的关注和对独特个人的肯定,正如钱理群所说,此时鲁迅把个性、自我的自觉强调到极致,进而“尊己而好战”^{[10]159}。另一方面,向外关注人的生存境况,在根于爱的创作中进行文学的社会关照。鲁迅一再表同情于他者的寂寞,在自我的寂寞中悲悯于人皆寂寞(也包括对民众的期望与失望),以达到个人的寂寞的升华与某种程度的超脱——这也正是所谓的鲁迅之爱——“展现以个体主观精神独立与自由为中心内容的人的精神价值的终极关怀,以及由此设计出民族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的宏伟蓝图。”^[11]这说明,鲁迅的孤寂并非顾影自怜。寂寞对于鲁迅而言,不仅十分自觉地指向自我的审视,而且始终具有个人—他者的深广内涵。可以说,鲁迅的先觉者的思想意识正是以孤寂意识为基底逐渐形成的。在孤寂意识的影响下,鲁迅对社会、家庭、个体精神等方面的问题有了一系列的发现与思考。

鲁迅孤寂意识下的第一个发现与思考,是立人的艰难(社会的层面)。其实,鲁迅为人生、改良人生的启蒙主义理想以及改造国民性的心路,无不伴随先觉者的孤寂感。如前所述,孤寂意识使鲁迅关注人的生存境况,以根柢在人来避免“以独制众者古”“以众虐独者今”^{[12]28}的历史循环。正是这种孤寂感,推动着鲁迅不断地探寻民族魂灵,试图建立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就是说,“人的发现,是他的精神家园之寄托,自然也是超拔孤独的心理杠杆”^[13]。然而,鲁迅又这样写到:“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12]84}鲁迅也提到了其作品出版后所受到的谴责,再联想到他一再慨叹那些为民众战斗却反为民众所消灭的孤独的精神界之战士,联想到他只能“横站”的“独战”的悲哀,我们就看到了鲁迅的启蒙之语来自于也最终归于孤寂的独语。

当鲁迅遭遇、承担寂寞与隔阂时，他还意图在童年及故乡中找寻精神的落脚点，但找寻的结果竟是始于孤寂而终于孤寂，这让他陷入了更深的孤寂当中。与《野草》同时创作的是回忆性散文《朝花夕拾》，还连带《呐喊》《彷徨》两部小说集。在此，我们看到了鲁迅孤寂意识下的第二个发现与思考：故乡（现实的和精神的）的无法返回（家庭的层面）。

在鲁迅那里，孩子和故乡，都有着回到生命的原初的意义。其在写作《呐喊》时期有关故乡的记忆，也通常和孩子美好天性的书写联系在一起。其1921年所写的《故乡》：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沉迷于闰土心里无穷无尽的稀奇的事。同是写于1922年10月的3篇小说中，三太太给孩子买来看的天真烂漫的小兔子，充斥着童真与和气（《兔和猫》）；爱罗先珂神游旧地缅甸神奇的夏夜，在北京养成池中的蝌蚪，满院飞跑的鸡鸭（《鸭的喜剧》）；依稀浮现的坐着白篷的航船，看戏、煮罗汉豆的画面（《社戏》）。可见，1921—1922年间，鲁迅或是直接描述自己的故乡，或是通过建构恬静自然的家的场面来完成精神的还乡。然而，童真是否能够存留，故乡是否能够回去呢？闰土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黑猫神不知鬼不觉地吃了小兔子，爱罗先珂君绝无消息、不知去向，“我”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这实际是鲁迅自我生命体验的外化。鲁迅自进入三味书屋起，他的童真的记忆就被冲淡了。此后，故乡带给他的炽痛、抽离，也就打上了知识分子只能精神还乡的宿命般的烙印。鲁迅真正感受到精神还乡的绝望集中体现在后来的《彷徨》集中。如果说在《呐喊》中，故乡不再是记忆中的模样，因此不可返回，那么到了《彷徨》，则是已无家可回。这一变化显然与1923年兄弟失和而几易其所有关。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同样写作于1924年2月的三篇小说：《彷徨》首篇的《祝福》开篇即提到，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在酒楼上》，则只是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又说南来只能算一个客子，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在《幸福的家庭中》，找遍各地也没有找到可以安置“幸福的家庭”的地方。到了1925年的《长明灯》和《示众》中，孩子们已经不自知地进了封建熔炉，归到看客的行列之中。最后，在《孤独者》中，则将此前信

以为有的孩子的天真本性也给予了否定。可见，这一时期的鲁迅之于故乡，已彻底沦为他者，他的怀旧也失去了载体。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在彷徨孤寂中发现最渴望找寻并用以安放灵魂的场所也破败的绝望和悲怆，这无疑更加深了鲁迅灵魂的颤栗和孤寂。

何止是故乡，单是恋爱、婚姻、家庭问题，也充斥着寂寞与无奈。长期缺少陪伴与爱的生活让鲁迅感受到了彻骨的寂寞，选择爱情时的犹疑又让鲁迅处于精神的矛盾之中，使他“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也”^{[14]646}，他甚至长期“沉湎于杯中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心理的自虐倾向^{[15]116}，而这也正是他向孤寂宣战、欲解脱孤寂而不能的一种表现。即便是婚姻，对鲁迅而言也不过是“两害相权”，“也有大苦，有大累”^[16]。许广平也有这样的回忆：“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我真痛苦万状。”^[17]可见对于鲁迅而言，不仅故乡无法返回，即便是可供承载个体生命和精神的最小单位——婚姻和家庭，也不能真正消解他孤寂的灵魂。这再次表明，在鲁迅的思想中，他对孤寂意识及对自身孤寂命运的认知始终十分清醒，这促使他在一切问题上都不会陷入盲目的乐观——这正是属于鲁迅的清醒。

当这一精神界之战士长期遁入对外部世界的体悟并痛苦地思索个体与社会的存在状态意图探寻出路时，他的思想就必将经过具体的现实能指而过渡为深邃的沉思和生命的哲学。于是，就有了鲁迅孤寂意识下的第三个发现与思考：《野草》及其生命哲学（个体精神的层面）。鲁迅曾对章衣萍说：“不断地反省自己，解剖自己，剖露出自己的血肉，就是我的哲学。”“当然，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会是非常痛苦的！”^{[18]196}《野草》发表之初，命名为“自言自语”。鲁迅所言的这种痛苦，也就透露出犹如在沙漠中独语的寂寞。如果从孤寂意识这一视角观察《野草》，不难发现，在《野草》24篇散文诗中有19篇鲜明地流露了鲁迅的孤寂意识。具有统罩全书哲思性质的《题辞》，即是鲁迅在因身陷动荡的政治局势与内心的矛盾中而产生的不能写、无从写的孤寂状态下写出来的^{[19]2,6}。可以说，《野草》某种程度上是鲁迅因不同原因而导致的孤寂心境下的产物。

其首先是因布不成阵、寻不到路的彷徨而导致的寂寞甚至阴暗心境,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身内的青春”的呼唤。于是,就有了被反复强调的深嵌着鲁迅孤独感的墙外的两颗枣树(《秋叶》);独自咀嚼黑暗与虚无又执意独自远行的影(《影的告别》);叫喊出“我现在在哪里呢,四面都还是严冬的肃杀”的“我”(《风筝》);在绝望中宁愿烧完也绝不冻灭在冰谷中的死火(《死火》);“抉心自食”,与“毒气和鬼气”以及“虚无主义”肉搏并将其埋葬的“我”(《墓碣文》)。其次是因自我即先觉者与庸众及外部世界之间的隔阂而导致的寂寞心境。于是,就有了宁愿以虚无和孤寂求乞,也要表达对“布施”与“求乞”的憎恶并怒其不争的求乞者(《求乞者》);以死亡即无戏可看,来向看客复仇的旷野中的男女(《复仇》);为群众献身却反遭其害的“人之子”(《复仇(其二)》);颤动着颓败线向以怨报德的青年们复仇的老女人(《颓败线的颤动》);“终于没有眼泪流下”以使爱人不觉他被杀之惨、仇人得不到杀他之乐来实现他的报恩与复仇的“我”(《死后》);因厌倦昏沉的夜给自身带来的寂寞与绝望而又意识到可供暂避的好的故事总是短暂的梦醒的“我”;从还能记得的时候起就只一个人孤寂苦行的拒绝布施与牵绊的“过客”(《过客》);“我”奔驰其间的“冰山”(《死火》)。其三是因惊异于青年的消沉与身外的青春的逝去而导致的寂寞以及寂寞中的追寻。于是,就有了因增添了自身内在寂寞感而产生的绝望以及与之进行的抗争(《希望》);即便处于荷载独彷徨的孤独之中,也要以死了雨的精魂自居而旋转于太空的孤独的雪(《雪》);然而使这一寂寞有所慰藉的是,鲁迅终于看到,青年的魂灵屹立在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一觉》)。其四是当他决意孤身战斗而发现所对者竟是无物之阵的寂寞。于是,就有了终于在无物之阵中孤寂空虚的衰老、寿终却执意举起投枪的战士(《这样的战士》)以及同样在无物之阵中凋零的黄蜡似的病叶(《腊叶》)。其五是死亡的紧张感而带来的思考以及无法真正解剖自己而带来的矛盾与痛苦,只能独自承担而导致的彻骨的寂寞。值得注意的是,经受肺病多年折磨的鲁迅,在去世前3天还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此病虽纠缠……已不危险,终当

有痊愈之一日,请勿念为要。”^{[20][17]}1936年10月以来,鲁迅多次在书信中表达了这一想法,而实际上学医出身的他应深知自己死之将近。正如冯雪峰所说,“他努力使自己不受死的预感的威胁所影响”,但“无论怎样,病却总在威胁他”,“乘他不备而侵袭他的心情”^[21]。独自承担死亡的侵袭,谁能知道这寂寞对他来说是何其彻骨,于是有了对将坠的病叶的斑斓只能在极短时下留存的感叹(《腊叶》);深知生命的尽头是坟却依然不屈地发问“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的过客(《过客》);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死后也要给民族再生的叛逆的猛士(《淡淡的血痕中》);有了死亡的生命使我知其非空虚、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的向死而生(《题辞》);有了抉心自食而无法知其本味的实有的黑暗与虚无,有了执意的不愿传染给他人而叫他人“离开”的独自承受(《墓碣文》)。所以,鲁迅在孤寂意识中产生的《野草》就是这样的生命哲学:他因清醒的孤寂意识而产生自我的苦闷与寂寞,进而去关照外部世界,在对身内的青春的审视中呼唤身外的青春,意图与自身的寂寞和鬼气进行纠缠、搏斗。

其实,当鲁迅在孤寂中发现了“立人”的艰难(社会的层面)、故乡的无法返回以及家庭的难以寄托(家庭的层面)、生命的哲思的痛苦(个体精神的层面),他还为自己找寻了一处精神落脚的所在——自然(兽)^{[10][250]}与黑夜。在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了鲁迅就是一只独自“钻入草莽、舔掉血迹”,深夜在旷野中嗥叫、写作的“受伤的狼”和“不详”的猫头鹰——这彻底地宣示了鲁迅精神的孤寂。

三、孤寂意识赋予了鲁迅对自身孤寂命运及复杂思想的清醒的自觉

我们不禁欣慰地感受到,鲁迅终归不是悲观主义与虚无主义者,他明确表示:“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22],“我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的”^{[5][112]}。这就引出了鲁迅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虚妄意识。鲁迅正是从不能确证的绝望中,导出了绝望的虚妄,进而把鲁迅从绝望的心理状态中拔出^{[23][112-113]}。有的研究者进一步指出:鲁迅对于孤独的否定也依赖于心理上的虚妄感,即所谓孤独最终也是虚妄

的，其无形中将孤独置于一个无意义的境地。正是孤独包括它的无意义赋予了鲁迅生命的自觉，使他感到自身的存在和生活这一首要事实。因此，孤独成了鲁迅一种独特的生命之源^{[15]68}，这当然也是对鲁迅孤寂意识的积极内涵的一种指认。需要追认并指出的是，鲁迅之所以能够将虚无、绝望、孤独化为虚妄，能够时时克服孤寂的侵袭，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他自身清醒的孤寂意识。与其说正是孤独赋予了鲁迅生命的自觉，不如说是孤寂意识赋予了鲁迅对自身孤独感及复杂思想的清醒的自觉。正是这样的意识，才使他的思想基底充斥着生命的亮色，才使他深知孤寂而没有身陷孤寂，深知虚妄而没有归于虚妄，才使他一边慨叹“我的心分外地寂寞”（体味到了自身的孤寂感），一边诉说“然而我的心很平安”（认知并把握了自身的孤寂感）^{[24]181}。

的确，鲁迅的孤寂、孤独个体意识与尼采、克尔凯郭尔等人的非理性思想有相通之处，即便与存在主义者萨特的思想也有一定的相近与暗合处，但也应该看到，鲁迅并非存在主义者。这也为我们透视其孤寂意识提供了一个视角。正如徐麟所说，存在哲学是在以个人存在为最终形式的本体论中展开的，而鲁迅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仍是民族的文化生存问题^{[23]120}。孙玉石也指出，鲁迅一直没有停止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他的“叛逆的猛士”已经超越了尼采的“超人”，而具有了个性主义战士与为被压迫者抗争的集体主义的猛士的双重色彩^{[19]282-283}。再联系起鲁迅对章衣萍所说：“反省自己，解剖自己，会是非常痛苦的！但一定要这样做，否则，无论是自己，还是国家、民族，都是很难长进的。”^{[18]196} 孤寂对于鲁迅而言，具有个人—他者的深广内涵，因此能够为他的阴暗孤寂的心绪融进积极的内省与民族关怀提供广阔的思想文化空间。

如果我们进一步触及鲁迅孤寂意识的肌理，会发现“叛逆的猛士”“绝望的抗战”，实际上都无法真正全面显示他处理孤寂时的心态。王晓明将鲁迅的一生概括为一次命运的摆布与三次拒绝摆布的逃离^{[25]523}，这期间他的复杂思想中始终伴随着虚无、鬼气、怀疑、悲观、绝望、黑暗以及对这些心灵体悟的抗争，这涉及了他思想的特质：中间物。研究者看到了鲁迅的中间物意识中

对过去、未来的怀疑，以及对现实的着眼与抗争，然而我们回顾他提出中间物这一概念时的心境，可以发现其依然深嵌在鲁迅深深的孤寂意识之中。中间物的提法来自《写在〈坟〉后面》。鲁迅在文中表达了这样的心境：哀愁袭击我的心，有些后悔印行我的杂文，人们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我的作品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壳，再经若干岁月，又当化为烟埃。最后，他又引用陆士衡的吊曹孟德文对作品进行总结：览遗籍以慷慨，献兹文而凄伤^{[2]298-303}。可见，鲁迅提出“一切都是中间物”时的心境是何其孤寂而哀伤。《希望》开篇即感叹“我的心分外地寂寞”。在对孤寂的绝望的抗战姿态中，隐藏着他对自己孤寂与被遗忘的命运的清醒的认识——鲁迅的思想，竟是如此复杂。

这样，我们不禁追问：鲁迅到底以何种态度对待自身遭遇的孤寂？其实他已经给出回答：“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14]452} 鲁迅在给许广平及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可以静观默想，精神上倒并不感到寂寞；我也并不觉得“孤独”，没有什么“悲哀”；“自以为在孤岛中度寂寞生活，咀嚼着寂寞，即足以自慰自赎”^{[14]587, 621, 646}；“周围虽颇寂寞，但也无多大不便”^{[20]199}。他也多次写下这样的文字：“人类总不会寂寞，因为生命是进步的，是乐天的”^{[2]386}；“在危险中漫游，是很好的。我漫步着，漫步着，在少有的寂寞里”^{[5]268}；请不要“坠入孤独和悲哀去”^{[6]539}。这是他对寂寞的喜欢（或是在心理上找到了与寂寞相“平衡”的状态）。他也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枯坐终日，极无聊赖”^[26]；“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4]189}。“因叹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无人可谈，寂寞极矣”^{[14]321, 563}；“漫谈的人材也寥若晨星，令人感到寂寞”；“上海更加寂寞了”；“上海依然很寂寞，到处呈现不景气”；“上海也寂寞如故”^{[20]260, 265, 270, 279}；“在身边则觉其烦，不在又觉寂寞”；“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我也时时感到寂寞，常常想改掉文学买卖，不做了”^[27]。这是他对寂寞的憎恶。这些令他憎恶的孤寂感的来源十分繁杂，即便是身体和精力已难以支撑外界袭扰的晚年，他也不得不承受着孤寂感的侵扰。冯雪峰曾回忆，鲁迅在1933年后并不愉快^{[21]71-72}。“自己营垒里

的蛆虫”和内部的背叛、青年对他的利用、冯雪峰和瞿秋白等好友的相继离开、对新的左联领导的反感、左联的解散、无休止的激烈的论争、对“宽阔光明的地方”的犹疑、死亡的逼视等，这一切都加深了鲁迅后来的孤寂感和悲剧感。这时我们仿佛听到了影的告别：“我独自远行……只有我被黑暗沉没，那世界全属于我自己。”^{[24][170]}我们仿佛看到了在荒原中、在黑暗的闸门下，舔干自己伤口的孤独而倔强的灵魂——这或许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孤独竟往往成为鲁迅心灵的避风港，唯有在孤独中，他才能得到宁静^{[15][78]}。

鲁迅对待孤寂的态度决定了他如何面对、处理他的孤寂，如何背负着孤寂去探寻前面的路。伟大人物都是孤独的，喜欢或者享受孤独，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伟大人物的精神特征。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对极度孤寂状态的排斥，否则，鲁迅何以一再慨叹对孤寂的憎恶？不可否认，偶尔的孤寂感的确可以给人以某种平和的状态，但人一旦长久地处在孤寂中，便会试图找到突破口加以排解以求得内心的平衡。鲁迅便是如此。他不可能真正摆脱孤寂与“鬼气”，但也不愿深陷其中。他“日益深刻地承认他的阴郁心绪的正当，却同时竭力地怀疑和拒绝这些心绪”^{[25][524]}。所以，我们应该看到，鲁迅的孤寂有其内指性，是指向他的灵魂和思想深处的，他一生辗转于在对孤寂的喜爱与憎恶中，他之所以没有被孤寂吞噬，是因为他能够将孤寂感化为清醒的孤寂意识，这显示了他的心灵的辩证法中对自身思想复杂性的认识与自觉。这种自觉，决定鲁迅会有意识地去驱解孤寂。在他的一生中，曾在思想上（“绝望的抗战”精神）及行动上做过无数次这样的尝试：钞古碑，投身古典书籍珍本，进行译介与学术研究，试图通过回忆过往来避开现实，“为了希求心的暂时的平安”而发明“骗人”；夏游长安，犹豫延宕却终于迈出追逐爱情的一步并获得家庭；在绍兴—日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之间漂流，试图寻求别样的人生“逃离”；接待青年与挚友；学习唯物史观并加入左联，试图寄托“宽阔光明的地方”；喝酒吸烟，应对激烈的论争，投入沉静的艺术创作；等等。

所以，鲁迅正是这样去面对、处理自身的孤寂（实际上，也代表了鲁迅处理自身思想中其他

情绪时的态度）：一方面，他身陷并沉浸在孤寂之中，甚至表现出自我折磨的倾向，时时遭受着一种伴随着幻灭感、命运感的精神磨难——“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9][4-5]}。他受难的结果不是对孤寂的超脱，而恰恰是对孤寂感及孤寂命运的接受，使自己不断感受到并确证孤寂这一事实，而他的孤寂，却丝毫不会减少。另一方面，“在体验人生的虚无与绝望的同时，鲁迅对生存的虚无主义持有否定的态度”^[28]，他有意识地与孤寂进行精神搏斗、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向实有的虚无作绝望的抗战——“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4][440]}——以求得暂时舒适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鲁迅说：“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14][81]}也就是说，鲁迅以孤寂意识为重要原点的思想是复杂情绪的统一体。这种统一在鲁迅看来，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生命常态。

美国心理学家卡特尔认为，人格特性可以划分为表面特性和根源特性两大类。表面特性是指经常发生、从外部可以观察到的行为；根源特性深藏于人格结构的内层，是制约表面特性的潜在基础和人格的基本要素^[29]。鲁迅以孤寂意识为核心的思想的复杂性正是其人格的根源特性，而时时表露出的或是虚无、鬼气、孤寂、绝望，或是充实、欢喜、光明、希望，都只是鲁迅应对某种现实体验而外化出来的人格特性的某个方面，而非其全部的思想指向。鲁迅孤寂意识的积极内涵在于：他以孤寂意识进入写作，并深深地感受、触碰到了自身的孤寂与感伤，而当他要开口向人言说时，又能够时时抚慰与平衡这种孤寂，在强烈的孤寂意识下对这种孤寂感进行警惕与审视，进而展开他对个人及民族出路的观照。这既显露了鲁迅思想与创作意图的全部复杂性，也是其孤寂意识与20世纪时代的孤寂、知识分子普遍的宿命般的孤寂对比之下的独特性所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鲁迅人格的鲜明特征。

参考文献：

- [1] 鲁迅. 鲁迅全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 鲁迅. 鲁迅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3] 陈思和，王德威. 史料与阐释[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190.
- [4] 鲁迅. 鲁迅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5] 鲁迅. 鲁迅全集：第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6] 鲁迅. 鲁迅全集：第6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7] 李欧梵. 铁屋中的呐喊[M]. 尹慧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 [8] 曾奕禅. 文艺心理学[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94.
- [9] 鲁迅. 鲁迅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0] 钱理群. 心灵的探寻[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 [11] 黄健. 论鲁迅的孤独意识[J]. 浙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23(1)：87-93，99.
- [12] 鲁迅. 鲁迅全集：第7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3] 王乾坤. 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文化价值观[M].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124.
- [14] 鲁迅. 鲁迅全集：第11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5] 吴俊. 鲁迅个性心理研究[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 [16] 鲁迅. 鲁迅全集：第1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13.
- [17] 孙郁，黄乔生. 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85.
- [18] 张梦阳. 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之二·野草梦[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
- [19] 孙玉石. 现实的与哲学的：鲁迅《野草》重释[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20] 鲁迅. 鲁迅全集：第1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1] 冯雪峰. 1928—1936年的鲁迅[M]// 冯雪峰. 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151，158，160.
- [22] 萧军. 萧军全集：第9卷[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62-63.
- [23] 徐麟. 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M].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
- [24] 鲁迅. 鲁迅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5] 王晓明.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M]. 修订本.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26] 鲁迅. 鲁迅全集：第15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 [27] 鲁迅. 鲁迅全集：第13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76，380.
- [28] 仲雷. 自欺意识与生存困境：《伤逝》意蕴再探析[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1)：109.
- [29]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公共必修心理学教研室. 心理学[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239.

责任编辑：黄声波